



把握國家發展方向 積極部署更好對接

議事論事

林鳴謙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日前表決通過，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於2026年3月5日在北京召開；日前召開的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四十五次主席會議，建議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於2026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對香港而言，這是又一輪關乎國家發展方向、政策取向與制度安排的「年度大盤」。而2026年的兩會處於「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局的時間節點，香港決不能以旁觀者心態「等消息」，而應當密切關注、持續跟進，並將之視為把握國家戰略的重要窗口、更好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機遇。

兩會之所以與香港息息相關，關鍵在於它從來不是抽象的「高層政治」，而是把國家治理的核心議程集中呈現在同一張桌面上：政府工作報告確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預算與計劃安排體現資源投向與政策力度，最高法、最高檢等報告折射法治環境與治理重點，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則呈現立法與監督方向。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本次大會的建議議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審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審查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審查202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等。這也意味着，2026年的兩會不僅要「部署一年」，更要「定調五年」——對香港而言，這種長周期的政策信號，當然需要社會各界的重視和關注。

從三個方向「盯緊」兩會

若說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共識，是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要全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那麼2026年兩會最值得期待的，恰恰是國家如何在「十五五」開局之年，把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講得更清楚、把改革與開放的節奏排得更扎實。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從來不只是「內聯外通」四個字，而是可以作出更多貢獻。

例如，能否把國際資金、國際規則、國際人才更有效引入內地與大灣區？能否把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法律、風控、仲裁、合規服務做成可依賴的系統？能否把創科成果轉化、把數字貿易與綠色金融的制度安排做得更成熟？這些都離不開兩會所釋放的宏觀政策與制度型開放信號。

具體地說，香港各界可從三個方向「盯緊」2026年兩會，既關乎大局，也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第一，是「十五五」規劃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何部署。香港近年多個重大工程——北部都會區、河套香港園區、跨境口岸與基建升級、金融互聯互通深化——本質上都需要國家級頂層設計來謀劃。當「十五五」綱要草案進入審議，哪些灣區機制會被制度化、哪些跨境要素流動障礙會被針對性拆解、哪些新產業方向會被明確列入重點任務，這些都會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投資、就業與產業結構。

第二，是如何把宏觀目標落到民生與

市場信心。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對外部周期波動感受更敏感；兩會釋放的增長目標、財政政策取向、擴內需與穩就業的力度，往往會間接影響香港的旅遊零售、航運貿易、金融市場，甚至樓市預期。尤為重要的是，國家在擴大服務消費、推動新型工業化、促進民營經濟與科技創新方面的政策組合，香港能否把自己放進同一條政策鏈裏，主動提供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化平台，而不是被動等待「外溢效應」，這會決定香港在新周期中是跟跑、並跑，還是能創造新跑道。

當好「參與者」「貢獻者」

第三，是法治與治理現代化的信號。香港的制度優勢之一，是以法治建立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而國家層面的立法、司法治理重點，往往也會影響跨境合規、數據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反洗錢與金融監管協同等議題。人大會議的議程亦顯示將審議多部重要法律草案，包括「國家發展規劃法」等。對香港來說，這類制度建設意

味着國家治理將更重視「規劃—法律—政策—執行」的閉環，香港要當好國家發展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就要更懂得在規則層面對接，而不只是項目層面配合。

香港各界關注兩會，不應只是看相關的涉港表述，而是要藉此把握國家下一步的目標方向，把握資源投向與改革重點，然後思考如何助力特區政府發揮香港自身優勢，更好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至於一般市民，關注兩會也不能流於表面，而是看政策最終能否落到「生活的確變好」：就業機會是否更多元、城市治理是否更有效、公共服務是否更精準、社會預期是否更穩定。

站在「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局的交匯點，香港應當做的，是把關注變成準備，把期待變成行動——早一步把握國家發展的方向，早一步主動對接到具體工作上，以己所長為國家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反制「組合拳」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議論風生

宇文

12月26日，針對美方高達111億美元對台軍售案，中方祭出反制「組合拳」，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宣布對20家美國軍工企業及10名高管實施全面制裁，反制措施包括凍結其在華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以及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這一行動標誌着中方的反制已從「事後反應」轉變為「即時反擊」，從「單一懲戒」升級為「系統壓制」。

外交部發言人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任何在台灣問題上越線挑釁的行徑都將遭到中方的有力回擊，任何參與對台售武的企業和個人都要為其錯誤付出代價。

精準打擊美國要害

2024年以來，中國已8次因對台軍售問題對美採取行動，形成「軍售一次，反制一次」的機制化模式。但此次反制的深度與廣度顯然不同以往。在法律層面，中國依託《反外國制裁法》《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構建起堅實的法律屏障。商務部同步發力，發布關於加強相關兩用物項對美國出口管制的公告，禁止兩用物項對美國軍事用戶或軍事用途出口。這一舉措直擊美國軍工複合體的要害。

眾所周知，美國軍工生產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由於中國在稀土、鎂、鎢等關鍵戰略資源上的主導地位，

一旦被列入反制清單，美國企業將面臨供應鏈斷裂、製造成本飆升甚至項目推遲的困境。中國「精準點穴」式的打擊，遠比單純的口頭抗議更具痛感，直接動搖了美台軍售的物質基礎。

除了直接針對軍工企業的制裁，中國還採取了靈活的經濟反制手段，以精準打擊美國的利益。例如中國取消了13.2萬噸美國小麥訂單，這一舉措極具戰略智慧，既給美國農業區這一共和黨關鍵票倉帶來真實痛感，又保持了博弈的迴旋餘地，避免了局勢的無限失控。

軍事層面，解放軍早已構建起「全域封控+精準打擊」的雙重威懾體系。今年以來，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的聯合演訓中，山東艦航母編隊與前出的海空兵力進行了艦機協同、區域制空等科目演練，形成了外阻內封的態勢。空中方向，掛載鷹擊—21空射彈道導彈的轟—6K戰機編隊對台島東部重要軍事目標實施多波次模擬聯合打擊；海上方向，054A型護衛艦等艦艇在台灣海峽相關海域組織演練，重點實施查證識別、警告驅離等科目。這種常態化、實戰化的演訓和封鎖體系，已形成強大的實戰威懾力，讓「以武助獨」成為一場成本高昂且毫無勝算的豪賭。

在外交與國際輿論場，中國重申關於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立場，堅定維護一個中國原則，183個建交國共同恪守這一外交承諾，形成了強大的國際共識。在東盟、上合組織等多邊平台，中國推動制定《區域安全

合作準則》，將台灣問題納入多邊安全框架，讓「一個中國原則」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可動搖的組成部分。這標誌着中國的反制策略已實現從「雙邊博弈」到「多邊制衡」的跨越，借助多邊機制孤立挑釁勢力，讓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在國際上「失道寡助」。

重塑台海博弈規則

中國打出這套「組合拳」，是基於戰略全局的理性考量與深厚底氣。中國選擇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博弈之道，通過法律、經濟、外交與軍事的多維共振，最大限度維護國家長遠利益。同時，中國強大的國防實力和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反制措施的有效實施提供了堅實底氣。解放軍艦艇總數達395艘，殲—20隱身戰機總量突破300架，東風系列導彈形成多層次打擊體系，這些硬實力讓中國的反制措施不是「紙老虎」，而是具有實質威懾力的有效行動。

任何外部勢力的干預都無法改變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實，也無法阻擋中國最終將統一的歷史大勢。美方的「以武助獨」只會讓台灣陷入「買武器、欠債、再買武器」的惡性循環，擠壓民生空間，將台灣推向兵兇戰危的境地。而中國的精準反制，既展現了維護核心利益的堅定決心，又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戰略智慧。這套「打蛇打七寸」的「組合拳」，不僅是為了懲罰挑釁者，更是為了重塑台海博弈的規則，為最終實現完全統一奠定堅實基礎。

國際關係學者

匯聚改革動能 展現香港韌性

站在2025年的歲末回望，這一年對香港而言充滿挑戰。大埔火災帶來傷痛不會輕易消失，但救災善後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港人勇敢、團結、堅韌的精神。火災過後順利完成第八屆立法會選舉，則彰顯了港人勇於改革的決心，希望透過完善制度機制防止悲劇重演。



港事港心

龍子明

時的冷靜，更體現在災後的重建中不迴避制度缺陷的勇氣。香港的團結，不僅是災難當下的相互扶持，更是長期攜手改善社區安全的承諾。香港的堅韌，不僅是忍受傷痛的能力，更是從克服傷痛中長出希望的力量。

帶着希望繼續前行

雖然在意外中逝去的生命不會回來了，但不止他們的親屬，全港市民也不會忘記他們；對於為救災善後工作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他們的無私奉獻永遠會在這座城市傳頌下去。

這一年，我們失去了許多，但也找回了曾被遺忘的東西：我們彼此需要，我們彼此相連，我們都是香港人。讓全港市民一同帶着希望繼續前行。

災難是不幸，但也提供了香港社會自我革新的契機。從技術層面看，災難促使法規完善、設施升級；從社會層面看，共同抗擊災難強化了集體意識，凝聚了城市精神。

災難終將過去，但重建之路漫長。這句話道出了災難後人們的複雜心境——既有對未來的希望，也有面對艱難現實的清醒。重建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修復，更是社會結構、人際關係、精神家園的重構。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持久戰，需要耐心、毅力和持續的投入。

然而，正是這種漫長的重建過程，最能彰顯香港的韌性。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房屋，更是對生活的信念。漫長的重建路上，我們學會了珍惜當下，也懂得了守望相助的力量。災難終會過去，而我們在重建中獲得的成長與連結，將成為抵禦未來風雨的最堅實堡壘。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中歐重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契機



國際觀察

宋魯鄭

俄烏衝突與特朗普當選都是本世紀最重要的黑天鵝事件，對歐洲造成空前的威脅和挑戰。以至法國主流媒體都不約而同一再地使用「俄羅斯—美國軸心」一詞。「軸心」在西方現代歷史上一向用於有嚴重威脅的敵對勢力。只是今天的歐洲儘管面臨俄羅斯和美國雙重夾擊，但中歐關係並沒有因此而改善。

2019年歐盟把中國定性為系統性競爭對手，2023年和中國有密切經濟關係的德國也步其後塵。今年荷蘭則以強行接管安世半導體的行動證明自己的立場。當前歐盟面臨如此外部困境也不改變對華政策，中歐關係難以有質的突破和改變。這說明中歐關係要想有破冰點，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歐洲自身的變局。

進入21世紀以來，右翼政治勢力在西方開始取得更大話語權。最早的標誌性事件是2002年法國右翼政黨領導人勒龐歷史性的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可謂21世紀的先聲。直到今天右翼政治力量在歐盟27國

中的9國執政、特朗普則兩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由於右翼政治勢力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民眾支持，在現行西方民主體制下，整個歐盟右翼化已經難以避免。特別是最重要的法國和德國，右翼政黨的支持率都高居第一。右翼政黨執政能成為中歐關係破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

一是右翼政黨認為它的首要敵人和威脅是外來移民、主張多元主義消解民族特性的政治精英和放棄國家主權的全球主義者。相應的，他們執政首要的目標是恢復國家主權、強化本民族文化特性、驅逐外來移民。

這可從特朗普執政後的表現得以印證：他大量退出國際組織，以擺脫對美國的影響。同時禁止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移民進入，嚴厲打擊非法移民，以維持白人的主導地位。同時實行單邊主義，極力反對全球化。當然國內打擊政治反對派和不認同他的媒體更是比比皆是。

在這種理念下，從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具體效果來看，即使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構性因素都在，但中國不但不是美國唯一的打擊對象，連最重要的對象都算不上。比如它傾向俄羅斯的立場對歐盟安全造成

很大的損害，但和中國只是經濟爭端。同樣是採購俄羅斯石油，美國只制裁盟友印度，但卻對中國只停留在口頭要求上。

二是右翼政黨不認可西方「最新」的價值觀，認為這是導致今天西方問題的根源。比如以人權為名接納大量難民，以自由之名任其在歐洲隨意流動，以民主為名給予他們投票權，並進而影響西方政治。

價值觀是過去歐美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領域。價值觀和經濟利益不同，無法妥協。以前歐美認為中國的成功已經對它們的價值觀形成替代、構成挑戰。這是歐洲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的主要原因。右翼政黨執政則消除了東西方最主要而且無法妥協的衝突點。

特朗普迄今為止的兩個任期中，中美雙方從來沒有在價值觀上發生過衝突。中美對抗都只是在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關鍵原材料等領域。所以特朗普時代，中美之間不管對抗得多麼激烈，往往可以很快達成妥協。

三是右翼政黨基本上都不是全球主義者，不願意捲入全球事務中，認為代價又高又沒有收益。放到國際現實中就是不干

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他國內政，也是東西方對立和衝突的一個根源。

像特朗普不僅不願意捲入外部衝突，甚至連對外援助都放棄。他再度執政當天就暫停所有對外援助90天，四天後乾脆直接下令立即暫停絕大多數對外援助項目。一個月後就決定砍掉美國國際開發署90%的對外援助項目，國際開發署總部也被關閉。國際開發署是冷戰時成立的，它以人道主義為名、宣揚美國的價值觀並配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通過附加各種條件的援助來干預發展中國家的內政。這包括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支持。

這同樣可以理解，何以特朗普再次當選後，急於結束俄烏衝突，以讓美國脫身。四是右翼政黨注重具體的利益，因此它們往往更加務實，反而能正視國內、國外存在的問題。比如移民問題和帶來的各種影響，左翼政黨都避而不談。對俄烏衝突，它們認為軍事手段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再打下去也只是個無底洞。但左翼政黨卻要爭取最後正義的勝利。像台灣問題，特朗普就能一針見血的指出，「台灣這麼小，離美國這麼遠。中國這麼強大，台灣又離大陸這麼近。」但這樣實事求是的話政黨

是說不出口的。它們只會強調所謂的民主、自身的道義諸如此類。特朗普則簡單乾脆：讓台灣投資美國、台積電去設廠、強迫台灣大量採購武器。先把風險轉為收益。至於歐洲的右翼政黨，更是連對台灣多看一眼都不會。

正是由於右翼政黨務實性，它們往往能處理好和各大國的關係。比如匈牙利作為西方眼裏的右翼政府，它能和中國、俄羅斯、美國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才是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相反今天的歐盟則和中俄美關係都緊張。

此外，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注重利益的右翼政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它們同樣希望以經濟成功來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和政治理念。

因此，如果日益獲得歐洲民意支持的右翼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執政，對中歐關係來說未必不是新的契機。此時的歐洲既不會視中國為威脅，也不會在價值觀上對立，更不會阻撓中國統一，而是追求合作共贏。到那時中歐才會重返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